

黑帮杀人埋尸17年，民警追捕奔波6万里

青海扫黑除恶第一大案“日月山埋尸案”侦破纪实

本报记者吴刚、蓝翔

以张成虎、马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，通过金场采金获利施惠，打压排挤竞争对手，攫取经济利益。经二十余年“洗白”，逐步转型，发展成为“以商养黑”“以黑护商”的涉黑犯罪集团。10月30日，青海省“扫黑除恶第一大案”公开宣判。这起以“日月山埋尸案”为代表的“8·07”涉黑专案，是目前青海涉案人数最多、时间跨度最长、社会危害最大的涉黑案件，也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。

“8·07”专案组自2018年8月成立以来，全国扫黑办、青海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高度重视，省公安厅党委跨地跨部门抽调的300余名精干警力，爬坡过坎，掀起一波又一波强大攻势。

3个多月地毯式搜索

2019年10月7日，海拔3600米的日月山被大雾笼罩。当天，专案组民警在109国道东向西方向33公里处的边坡旁，起获一具人体遗骸。经青海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DNA鉴定结果确认，遗骸系被害人马某珍。2002年3月，犯罪嫌疑人马海山、王延雄等人经预谋，将被害人马某珍强行挟至西宁市湟中区一片黑刺林附近进行殴打，并向其生意伙伴索要赎金125万元，马某珍乘机逃脱。

一个月后，“8·07”涉黑组织主要犯罪嫌疑人马成伙同马海山、王延雄、马登月等6人，再次将马某珍绑架，挟至湟中区大源一水渠旁，拖拽车下后殴打致死。

暮色合拢，载着被害人尸体的皮卡车，途经拉脊山，行驶至日月山垭口附近停下。凌晨一点，远处湟倒一级公路的施工车辆正加班进行倒土作业，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尸体抬出，掩埋至路基下后逃离现场。

2019年4月，在侦办“8·07”涉黑专案时，专案组发现被害人马某珍被绑架杀害的线索，随后将这起命案与涉黑案件并案侦查。

“埋尸发生在18年前的夜晚，犯罪嫌疑人对埋尸地点记忆模糊，加之18年间青海湟倒一级公路的新建和多次翻新，嫌疑人辨认的埋尸地点各不相同，这对我们找寻尸体非常不利。”“8·07”专案组“日月山埋尸案”负责人说。

“我们专案组民警往返日月山近百次，通过各部门协调、警犬气味鉴别、卫星图和施工图比



▲2019年10月，在“日月山埋尸案”被害人疑似被埋地点，专案组正在寻找被害人尸骸。
新华社发（青海省公安厅供图）

对、走访当时项目分包负责人和多名施工人员逐步缩小范围，最终通过现场勘验找到尸骸，从而打开了专案侦破的突破口，进一步获取了侦破案件的关键证据。”这位负责人说。

苍茫的日月山下，横跨40余公里的疑似埋尸区域，近200名民警，3个多月风餐露宿地毯式搜索，在起获遗骸那一刻，所有在场民警沉默不语。

“扫黑除恶、匡扶正义”，被害人马某珍家属送来的锦旗上，印着这八个烫金大字。一名专案组民警看到锦旗，没能忍住眼泪，“我们的搜索过程确实艰辛，但看到这几个字，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！”

正义不缺席，邪恶有其报。2001年3月11日，被害人马某德与妻子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自家门口会遭遇不测。那天晚上，当两人像以往一样上楼回家时，蹲守在二楼平台的犯罪嫌疑人杨生录用方形铁锹，将马某德妻子打晕在地，马某德向楼下跑时，被蹲守的马成和追上来的杨生录围堵，连砍21刀，手脚筋被砍断……一年后，马某德因肝病去世。

“8·07”专案组负责人介绍，2001年，涉黑组织的主要嫌疑人张成虎，在位于玉树藏族自治

州曲麻莱县秋智乡采金，认为同在当地采金的被害人马某德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，遂指使马富录，安排马成和杨生录对其进行殴打。

“让我父亲的惨案得以沉冤昭雪，让扫黑除恶落到实处，是我们老百姓的希望。”被害人马某德女儿含泪说道。

10月30日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成虎、马成等人以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开设赌场罪、寻衅滋事罪等10余项罪名，一审公开宣判，数罪并罚，分别判处张成虎无期徒刑、马成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案其他37名成员，也受到了有期徒刑2年至23年不等的刑罚。

不论时间跨度多长、不管办案难度多大，都要揭开事实真相——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殷殷期盼，是专案组人员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坚定信念，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铮铮誓言。

在厨房暗洞完成最后的抓捕

2020年10月16日，专案组在西宁市湟中

区抓获在逃人员马海云。至此，青海“8·07”专案组织成员全部到案。

16日7时28分，“8·07”专案追逃组民警在对马海云亲属家的厨房进行搜查时，察觉到异样。“家中长期无人住，一摸炕头，却有余温。”炕头对面，一张堆放杂物的桌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。拉开围挡布帘、挪开杂物箱，露出一个仅容一人平躺的暗洞。

“马海云当时正缩在洞里。”专案民警对记者说，“那个洞就是他藏匿多日的窝点，平时他躲在屋里，门口一有风吹草动就钻进去。”

历时一年多，追捕行程累计3万多公里，足迹远至海南三亚，白天越山岭、深夜守疑处……专案组终于将最后一名团伙成员抓捕归案。

专案追逃组负责人感慨道，“同乡同村同族”是该涉黑团伙的一大特征，“涉案人员多，‘亲戚套亲戚’，互相包庇窝藏，追捕工作难上加难。”

专案组民警曾冒着大雪，在嫌疑人家门前连续蹲守近20小时。“熄灯以后还要再等等，第二天天不亮继续返岗侦查，这些仅仅是追逃工作一些很小的细节。”专案组民警说。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正是专案攻坚阶段。专案组民警冒着被感染的风险，克服疫情带来的不便，赶赴湖北荆州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马成彪。

逃犯虽落网，要想令其认罪服法，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“融冰”之战。据专案审讯组成员介绍，本案犯罪嫌疑人多为曾被打击处理的前科人员，深知罪行深重，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，审讯期间表现出很强的对抗心理。

“审讯初期，有的嫌疑人没一句实话，绞尽脑汁跟你打‘游击战’。”专案组民警说，“被问烦了，就对专案组民警直接破口大骂。”

马成落网后，审讯工作一度无实质性进展。抱着“开口闭口都是死”的心态，马成沉默如顽石，闭口不提犯罪行为。

为找出马成“软肋”和“痛点”，审讯组系统了解其成长过程、社会经历和家庭成员，在其“证据册”“时间轴”里寻找作案规律，以事实证据攻心、借政策法律教育、用真诚关心感化……

2019年10月，马成终于首次交代“日月山埋尸案”犯罪行为。

经查，以张成虎、马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敲诈勒索、开设赌场、收取保护费、控制黑车运营、插手民间纠纷等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手段大肆敛财，历经20年，已逐渐涉足酒店、房地产开发、道路施工等领域。

“只有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，才能真正做到‘黑财清底’，连根拔除黑恶势力，防止死灰复燃。”专案组民警说。

专案打财组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全链条核查涉案财物流转轨迹，对涉案资产进行详细甄别定性，坚持依法认定、查处涉案财产，做到应查尽查，应扣尽扣。

自成立以来，“8·07”专案组共摸排、征集各类线索220条，立案侦办案件66起，抓获涉案嫌疑人126人。处理好这般庞杂的信息数据，确保侦查、审讯等工作顺利进行，离不开专案组重要的“神经中枢”——材料组。

据材料组负责人介绍，材料组负责对接其余8个组及其下设的24个小组，所有案件线索、证据材料和侦查方向等信息，事无巨细，都必须由材料组汇总分析、审核把关。

材料组共13人，整个专案组规模一度超过300人。“压力可想而知，但大家异常团结，啃硬骨头的精神非常强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
杜绝“见黑见恶不见伞”

“8·07”专案组负责人介绍，通过两年多时间，把这个违法犯罪集团彻底打掉，对净化社会环境、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。

青海省纪委监委表示，及时成立惩腐打伞专案组，以双专班模式，同步推进刑事案件侦办和惩腐打伞，深挖“8·07”案中公职人员涉嫌腐败和保护伞问题，杜绝“见黑见恶不见伞”。

青海副省长、公安厅厅长王正升表示，这起收官大案要案案案顺利移送审查起诉，离不开全国扫黑办、公安部、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，离不开“双专班”的互通共享、优势互补、攻坚克难，离不开兄弟省市公安机关大力配合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，离不开全体办案人员的忠诚担当和不懈努力。

受访政法专家表示，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遍性、深层次问题，需从法律、政策、制度、机制层面研究解决办法，形成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的长效机制。

编辑刘梦妮

行情好时不让红薯出县，行情差时拒绝托底收购，“公司+农户”变成公司“掐”农户

江苏泗洪：薯农卖红薯为何卖出“薯怨”

本报记者郑生竹、赵久龙

位于江苏省北部的泗洪县，是我国传统的红薯主产区。为了让薯农增产又增收，当地以土地入股等方式，与龙头加工企业合资组建产业联合体，推出保底价收购。

不少村民反映，今年红薯市场行情大幅下行，龙头企业并未兑现保底收购的承诺。而去年红薯市场价高于保底收购价时，当地镇村干部却以限制运输等方式阻止外销。此外，当地不允许薯农自行加工制作淀粉，不少村民对此颇有怨言。

去年不让外销，今年却不来收

“去年是看住我们不让往县外卖，今年是承诺的保底价收购不兑现。”泗洪县红薯种植大户张荣强说，今年开春种植时，当地红薯种植加工龙头企业以1.5元一斤的价格统一派发种苗，并口头承诺用了种苗的种植户，等到红薯上市时，可按照每斤0.35元价格收购。由于今年红薯市场行情下行，一些红薯贩子到地头的收购价不到0.3元，当地龙头企业却不愿托底收购。

薯农张兰种了近9亩红薯，一亩地可以收五六千斤，“龙头企业不来收，放着也怕掉价，只能卖给小商贩了。”

几乎在去年同期，红薯市场行情上扬，周边地区 and 当地贩子的收购价高于0.35元一斤，不少薯农为每亩地多几百元收益，不愿把红薯卖给当地龙头企业。

为了不让红薯外流，当地出动镇村干部，以压坏乡村道路为由，不允许当地薯农将红薯拉到县外卖卖，只能卖给当地龙头企业。一些村民质疑这种做法涉嫌利用行政手段干预、垄断市场。

“我们又不是贩卖毒品，买卖就应该自由。”去年11月，重岗街道余庄村一余姓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很多农户就指望卖红薯讨生活，即使一亩地只能多收一两百元，村民们也不忍心低价卖。

记者走访泗洪县重岗街道看到，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家红薯收购点。红薯贩子韩女士说，每个村庄都有贩子收购，“当地龙头企业不怎么来收，很多农民把红薯卖给我们，一天能收十多万斤。”

记者调查了解到，包括重岗街道在内的泗洪县西南岗地区，多为高低不平的旱地，地力贫瘠，以种植“懒汉作物”红薯为主。这里是全国传统的红薯主产区，不少家庭世代种植。由于红薯行情波动不定，薯农经常增产不增收。

2018年，为帮助分散的薯农抵御市场风险，当地成立了西南岗土地股份合作社联合社，与当地龙头企业——江苏美阳薯业发展有限公司，共同出资组建美阳红薯种植产业联合体。

美阳公司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签订红薯种植销售协议，实行统一种植规划、良种供给、集约管理、价格收购和加工出售，并明确约定红薯保底收购价0.7元/公斤，市场价格高时随行就市。在不少



▲10月30日，泗洪县重岗街道余庄居一处红薯收购点。 本报记者赵久龙摄

薯农看来，并未起到“早涝保收”的作用。自去年爆出强制薯农买卖事件后，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前往当地核查后发现，限制红薯外销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，已要求整改。

张兰等不少薯农还反映，美阳公司在统一收购时爱打白条，不结现钱，卖完要好几个月才拿到钱，心里不放心。此外，市场行情好时，美阳公司的收购价并未水涨船高，导致今年不少土地合作社与美阳公司解除了种植收购协议。

“去年合作种植面积有3万多亩，今年订立协议的只有6000亩左右。签订协议的确保三毛五每斤收购，没订协议的也不是不收，但得按照市场价来收。”美阳公司相关负责人裴永辉回应称，按照公司和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规定，收购时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，耽误了打款时间，但肯定不会赖账。

薯农质疑龙头企业“吃独食”

不少薯农还反映，当地只允许美阳公司制粉，却以环保为由禁止村民私自小作坊制粉。近年来，每到红薯收购季，一些薯农就偷偷自行制粉，而当地镇村干部不断劝阻，双方之间展开一场拉锯战。

“我们这里祖祖辈辈以制粉为副业，现在以环保为由不让做，影响红薯种植收益。”重岗街道余庄村一付姓村民称，如果允许制粉，一亩红薯能多收上千元。现在农村畜禽禁养，留守在家的村民

靠什么致富呢？只能靠种地了。可种了红薯还不让制粉，村民们很不理解。

不能制粉对种植大户损失更大。张荣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一亩地按6000斤红薯收成计算，卖红薯才有1800元左右毛收入，如果可以制粉，以五斤红薯制一斤淀粉计算，一亩红薯能制成1200斤淀粉，按2.8元一斤市价计算，一亩地能有3300多元收入，利润高了将近一倍。

当地因何不允许薯农私自制粉？重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该街道辖区内红薯种植面积约为1.5万亩，长期以来村民有种植红薯、加工制粉的传统，但小作坊设备老旧，且无环保措施，加工生产的废水直排附近河流，影响生态环境。

对此，张荣强等种植大户反映，即使不能制粉的政策说得通，也没有一碗水端平。同地市的宿城区、泗阳县、沐阳县以及隔壁淮安市，都可以办红薯制粉的小作坊。现在一些种植大户只能从外地买半成品回来做粉丝，“他们是从我们这里买的红薯回去制粉，我们却要买回头来把淀粉买回来做粉丝。”

在不少受访村民看来，制粉废水回田，是可以兼顾薯农利益和环境保护的。“制粉废水回田不仅不会造成污染，还可以增加土地肥力，耕种时少施点尿素。”重岗街道一李姓村民说，制粉废水排放到沟的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，但排到田地里完全可以循环利用。他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显示，为了说服干部允许他们制粉，一些村民现场舀起废水喝起来。

重岗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雪琼表示，有的种植大户直接在田里挖坑制粉，废水直接排放到沟渠里，污染河道。过去他们可以到隔壁的安徽泗县制粉，由于当地已经加强监管，这个通道也关闭了，不少大户因此难以接受。

当地县委办提供的材料称，红薯制粉产生的废水COD、氨氮等污染因子很高，会对河湖水体造成严重污染。随着环保力度加大，小农户加工散乱点已被取缔。美阳公司通过与上市企业广西宁明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合作，已新添一条日处理1800吨废水处理设备，红薯加工废水集中处理后能达标排放。

为民致富的联合体为何村民不买账

当前，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种植户”的模式正在多地推行。近年来，一大批工商社会资本下乡后，对农村产业兴旺起到了促进作用，但有的没有处理好与小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问题，未能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，导致出现“富了大户未富民”“肥了老板瘦了老乡”等问题。泗洪不少薯农选择退出红薯种植产业联合体，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模式面临诸多问题。

“好多农业龙头企业就是因为农民不守契约而倒闭。”在当地负责此项工作的基层干部看来，一些薯农契约精神缺失，这是一种种植模式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。行情只要稍微好一点，一些薯农就不守协议，哪怕一斤只高出一分钱，就偷偷卖出去，这导致龙头企业的原料来源得不到保证，从而影响后续加工环节的利润生成。一旦红薯行情走低滞销卖不掉时，很多农户就会去找政府兜底。

而在当地一些村民看来，禁止制粉的老问题没有解决，联合种植模式也未让他们尝到甜头，从而导致合作积极性不高。一些村民还反映，所谓的龙头企业“二次分红”也未发到村民头上。
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，利用行政力量介入买卖行为，反映出这类联合体利益联结机制存在漏洞。农业生产和市场本身有很多不确定性，龙头企业和小农之间很难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结和分担机制。稳定的利益共享需要龙头企业让利，保证农户早涝保收，这就要求龙头企业需要雄厚的沉淀资本，提高抗风险能力。

泗洪县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下一步将加强引导农户和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，探索价格保险机制。

重岗街道办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近期已联系大户、合作社、收购商，将上门设点收购，并计划对因路途遥远造成的运费差价进行补贴。同时，在法律、政策允许范围内，积极帮助薯农实现利益最大化。

（受访受访者要求，文中薯农为化名）
编辑黄海波

■记者手记

长期以来，小农户老龄化和兼业化现象突出，他们整体科技文化水平不高，多以分散经营、小规模独立生产为主，这导致农村土地产出率、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“三低”，农民持续增收乏力。

为了破解上述难题，让小农户更好对接大市场，好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。近年来，包括江苏泗洪在内的一些农业大县，相继引进产业化联合体项目。

“致富不致富，老农最有数”。接受采访时，泗洪县不少薯农掰着手指数算账，认为保底收购模式并未起到“早涝保收”的作用。今年红薯行情大跌，说好的价格保护也未兑现。从将信将疑到失去信心，这是当地薯农对红薯种植产业联合体的心理写照。

有专家表示，有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因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，甚至从“公司+农户”变为公司“掐”农户。稳定的利益共享需要龙头企业让利，而不是让农户成为代工，要切实保护农户权益，防止农民利益受到蚕食鲸吞。

脱贫攻坚工程，乡村振兴战略，呼唤着一切有利于乡村发展的生产要素流动。但是，任何时候，助农老农不能跑偏走样，更不能变为坑农害农。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”，只有让各方真正结成利益共同体，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才有望开花结果。

一座桥塌了，受阻的是一条康庄大道。如何服务小农户、提高小农户、富裕小农户，是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课题，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，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。

为降低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，泗洪县于去年9月推出小龙虾目标价格指数保险承保试点工程，颇受农民好评。“红薯收购风波”发生后，当地表示加快探索红薯目标价格指数保险，部分乡镇街道计划对外销红薯造成的运费差价给予补贴。相关举措能否落实并取得实际效果，还需假以时日留待基层群众来评定。

本报记者赵久龙、郑生竹

莫让助农利农机制跑偏走样